

钱基博的治史风骨

| 安健 文 |



文人相轻，相抵，相恶，相毁，此等陋习，屡见不鲜，历代皆有，于今更烈。然细细审之，亦有高下之判，鱼龙之分。如私下恶之，广众赞之；盛时抵之，衰时褒之；生前毁之，死后颂之。而反之者更多，往往盛时美言，败时并石。两者之风范，风度，风骨，绝然不同。而风骨对于一个史学家而言，尤其重要，这涉及到其所著史书乃信史与否？本文来说一说无锡籍文史学家钱基博的治史风骨。

钱基博的众多著述中，“两史”尤为著称，即《中国文学史》与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。而“两史”中，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更是他的扛鼎之作，也是他去世后再版最多的著述。我书架上便有多种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版本，其中最早的一本是民国二十四年世界书局的版本。史学界有一个共识，就是古代史好写，大抵早有定论。近现代史难写，因为许多人物与史实尚未盖棺定论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最难写之处就是与他同代的顶头上司汉武帝，最值得称道的也是他写了汉武帝，能秉笔直书，不为尊者讳，史称太史公笔法。

钱基博的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，虽说不能与《史记》相提并论，但其秉笔直书的难度却更大。《史记》写了汉之前三千年历史，只写了八十多年的汉朝当代史，占《史记》很小一部分。而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则均为作者执笔时的当代史，绝大多数人物当时还活在世上，少数去世者亦尚未盖棺论定，如何评述，确非易事。况且其中有些人物曾与作者有过交往，甚至有过齟齬与恩怨，如何置评，体现一个史学家的良知与风骨。

当然，钱基博对林琴南亦辞锋犀利，甚为不敬，他说“畏庐读书不富，矜气未化，涂泽其词，乃称祖宗桐城，恐诸老未必肯视为正出嫡子也。”

林琴南与钱基博均已沉浮于史册，个中恩怨，不说也罢。让人颇感意外的是，钱基博在相隔多年后，还执笔撰写了林琴南的史论。当年钱基博与林琴南有隙时，曾负气地说过这样的话：“畏庐尸居余气，文章真赏，来者难诬，身后千秋，尚赖博为论定。”读此言，笔者急欲取其书一睹，这便是钱基博的名著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，里面有对林琴南的评述。当年如此相互诋毁，现在畏庐名望过气，人亦谢世，身后千秋，钱基博将会如何评说？让笔者心存好奇，翻阅读之，则大感意外，同时亦深深感慨一位史学家的肚量与胸襟。

景：“吾母孙宜人既歿十有三日，日昃，谚所云皋复之夕也。其子若妇，奉箕持帚，汎扫宜人之前，帷幔陈设，莫改其故，而茶铛药炉一一宛若，而母不知其何在也，入室而勿见也。天乎，痛哉！”描绘平实而哀痛，读之让人心戚戚焉。然此起首一段，即迳录于畏庐悼亡母《先妣事略》最后一段：“呜呼！宜人之丧至是逾百日矣，不孝纾始及其妇刘氏縛帚，汎扫宜人之前。帷幔陈设，莫变其故。而茶铛药具一一在目，咸足悲涕。”许多文辞几乎一字未易，可见钱基博对林琴南之推崇。

对林氏评述中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钱基博对林译小说的态度与评价。因为林译小说是林纾最重要的文化遗产，也是他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的重大贡献，至今仍有较大影响。提到林纾，就绕不开他的林译小说。

钱基博在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对林纾译文给予了较高评价。其评述详细而生动，说林纾“挚友王寿昌精法西文，亦与纾欢好，遂与同译法国大仲马《茶花女遗事》，至伤心处，辄相对大哭。既出，国人论所未见，不脛走万本。”又曰：“纾译译既熟，口述者未毕其词，而纾已书在纸，能限一时许就千言，不窜一字，见者竟诧其速且工。”称林译小说，风动一时，信足为中国文学别辟蹊径。

钱基博能对林译小说如此评价，实属不易，其中有一个转变的过程，即先贬而后扬，此中与其子钱锺书亦有关联。想当年，钱基博受林纾排挤，向好友李审言诉苦，李亦与林有隙，两人同仇敌忾，抨击林纾，说其所译小说，纤秾巧靡，淫思古意，蛊惑后生，终以亡国。然而钱基博之子钱锺书却热衷于林译小说。年幼时，父亲要其读韩柳之文，他认为《说唐》《七侠五义》更好看。稍长，读梁启超译的《十五小豪杰》、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，但觉得文字较沉闷乏味。待商务印书馆出版《林译小说丛书》，钱锺书捧读之下，一发而不可收。他这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。他把林

譬如，钱基博与林琴南在学术上素有嫌隙，且积怨甚深。钱基博年轻时钟情选学，后于集部用力尤勤，于古代文人中，尤好韩柳之文，对于桐城派言必称汉唐，颇有微言。于是在某篇文章中伤及了被称为“桐城余脉”的林琴南。林琴南，名纾，号畏庐，文坛名宿，他对此十分恼怒，两人由此生隙，近一二十年间相互诋毁，而林的作派更甚。

钱基博在与前辈学者李审言的往来信函中，道及与林琴南的这段公案：“十五六年前，徒以博偶有持掖，见之不胜愤愤，无端大施倾轧，文章化为戈矛，儒林沦于市道，属商务不印拙稿，而不知博本勿赖市文为生。有友人介绍博任北师大国学讲座，其时畏庐在北京文坛，气焰炙手可热，亦作臧仓，致成罢论，知者多为不平。然博以为真读书人，正当化矜释躁，徵其学养。何意畏庐六十老翁，不能弘奖后进，而党同妒道若是！胜我不武，不胜见笑。”畏庐为人确实有些过了，不仅文章讨伐，还不让其出书，不让其在北京学堂讲学立足，欲置于死地而后快。对于一个年长两辈的长者，如此对待一个后生学子，确实有些不仁不义。

纾译的哈葛德、迭更司、欧文、司各德、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读，还将林译小说推荐给他的弟弟钱锺英看，钱锺英读了也迅速入迷，也与哥哥一个调子地赞叹：“畏庐以韩欧之文，译欧美小说，海内传诵，以为绝业。”兄弟两个都成了畏庐的“超级粉丝”。

刚开始，钱基博还想阻止两个儿子读林译小说。他在给钱锺书的信中婉转地劝说，少读时贤之文，少受其影响，“时贤声名愈大，设心愈坏”，钱基博所说的时贤即指林纾。但儿子听不进去，我行我素，不光爱看林译小说，还研究起林译小说，并写出了比较文学名篇《林纾的翻译》。当然这是后话。

最终钱基博也认可了两个儿子对林译小说的喜爱，以一个史学家的笔触，对林译小说作出了客观的评价。在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中，对林纾的译笔十分称许：“纾之文工为叙事抒情，杂以恢诡，婉媚动人，实前古所未有。”这个评价与他儿子钱锺书对林纾的评价相契合，精通外文的钱锺书，读了林琴南翻译英国作家哈葛德的小说后，感慨地说：“我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，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。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。”当年父子俩对林纾评价的不同调子，在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成了同一个调子。而这个调子推至今日，亦是评价得当的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

当然，钱基博在论述中亦指出了畏庐之不足，不过仅什之二三，瑕不掩瑜。

钱基博自传中说：“及畏庐身价既倒，博撰次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，平情而论，胸中既未尝有不平之气，更何必加以寻斧，效恶声之必反！故博前日于畏庐不肯降心以相从；而在时移势异之今日，亦不敢作寻声之骂，呵禁不祥。”钱基博于林畏庐，可谓盛时抵之，衰时褒之；生前毁之，死后颂之。这就是一个史学家的肚量、胸襟与风骨。

冬日灯下，掩卷思量，这本出版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文学史，距今已九十年了，流光飞逝，世事嬗变，然今日读之，依旧耐人寻味。何故，信史也。

